

萧放 著

岁时记与岁时观念

——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萧放 著

岁时记与岁时观念

——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时记与岁时观念：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研究 / 萧放著.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622-8511-3

I. ①岁… II. ①萧…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湖北—古代
②《荆楚岁时记》—研究 IV. ①K892.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3420 号

岁时记与岁时观念——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研究

◎ 萧 放 著

责任编辑：宋文静 冯会平

责任校对：肖绪旭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 话：027-67867792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press.ccnucnu.edu.cn>

电子邮箱：press@mail.ccnucnu.edu.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275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8

版次：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3.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上编 《荆楚岁时记》与中国传统岁时观念研究

绪论·····	3
第一章 荆楚与岁时：《荆楚岁时记》的题中之义·····	10
第一节 作者、注者及版本源流·····	10
第二节 荆楚——一个地域文化概念·····	21
第二章 分裂的时代与活跃的文化：《荆楚岁时记》成书背景研究·····	41
第一节 南北分立格局下的地域社会特性·····	41
第二节 六朝民众生活的新变化·····	48
第三节 民间著述的兴起·····	82
第三章 周秦以来的月令记述传统与《荆楚岁时记》的开创性贡献·····	90
第一节 月令记述与王官之时·····	90
第二节 《四民月令》与贵族庄园之时·····	108
第四章 中国民俗史上的珍贵文献：《荆楚岁时记》的民俗写真与民众 观念实录·····	125
第一节 大变动时代域内外文化交融的民俗写真·····	126
第二节 南朝荆楚民众观念的实录·····	147

余论 时间与空间 文本与生活：传统民俗志小议····· 172

下编 岁时民俗传统研究

第一章 斗蛋·秋千·施钩：《荆楚岁时记》中的春季节日游戏·····	183
第一节 立春时节的游戏·····	184
第二节 寒食清明时节的游戏·····	185
第三节 上巳“曲水流觞”的文人游戏·····	188
第二章 江汉稻作区传统农业岁时仪式述论·····	190
第一节 占验仪式·····	191
第二节 祈年仪式·····	197
第三节 禳灾仪式·····	202
第三章 传统年节礼俗及其当代复兴与传承·····	206
第一节 年节礼俗的主要类别·····	206
第二节 当代复兴与传承年节礼俗的意义及其途径·····	214
第三节 复兴传承年节礼俗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关系·····	218
第四章 守岁礼俗的历史流变与民俗传承·····	221
第五章 天时与人时的融通：清明礼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26
第一节 清明：“天时”与“人时”的融合·····	226
第二节 祭祖与踏青是清明两大礼俗主题·····	227
第三节 清明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231
第六章 端午民间文学的形态及其文化功能·····	234
第一节 端午民间传说故事的分类与口头传统的文化功能·····	234
第二节 端午民间歌谣的题材与民间情感表达功能·····	237
第三节 端午民间谚语的分类与民众生活的辅助功能·····	242
第七章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节日地位的浮沉与未来走向·····	247
第一节 近代以来传统节日在中国的境遇·····	247
第二节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出现复兴重振态势·····	251

第三节 中国传统节日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走向·····	259
附录一 荆楚岁时记（《广汉魏丛书》本，附清人王谟识）·····	263
附录二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安陆县志》岁时民俗部分·····	273
附录三 荆楚岁时新记·····	276
附录四 仙桃（沔阳）岁时民俗新记·····	279
附录五 《荆楚岁时记》各种版本渊源系统表·····	281

上编
《荆楚岁时记》与
中国传统岁时观念研究

绪 论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民俗志著作，是中国第一部记录地方岁时民俗的笔记体专书。本文试图从多种角度对这部重要文献所蕴含的学术文化意义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以明了民俗记述的传统方式及民俗文化的演进过程。

一、《荆楚岁时记》研究的学术意义

《荆楚岁时记》成书的六朝时期，是一个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期，中国民众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荆楚岁时记》以新的记述方式及时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民俗变化。在此后的一千四百余年中，《荆楚岁时记》不断被人们节录引用，成为展现当时民众岁时生活的历史依据。实际上这种文献传承与民俗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荆楚岁时记》正是在这种流动的文化中获得存在的价值。对《荆楚岁时记》的研究概略说来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史看，《荆楚岁时记》具有开创体例、树立范本的意义。我们从其著述原则、体例中可以总结出传统民俗志撰写的一般法则。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述：

(1) 它开创了岁时民俗志的记述体例。在中国很早就有依自然时序叙事的传统，如月令体裁的叙事，从《大戴礼记·夏小正》开始，有《吕氏春秋·十二纪》、《逸周书·时训解》、《礼记·月令》及《四民月令》等。以“唯圣人知四时”的想法（《管子·四时》），依据天象、物候的变化安排民众的社会政治生活（这在较早的时候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大都是一种政令性的叙述。而《荆楚岁时记》一改月令传统，以平常人的眼光，依照岁时节俗日程，记述民众在年度周期的岁时生活。自此之后，中国岁时民俗有了专门的记述体式，从而使中国岁时民俗有了较完整的记录。在《荆楚岁时记》之后，中国民俗史上出现了岁时记录的著述系列，如《秦中岁时记》（李

綽)、《乾淳岁时记》(周密)、《岁时广记》(陈元靓)、《北京岁华记》(陆启泓)、《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燕京岁时记》(富察敦崇)等。

(2)《荆楚岁时记》在记录方法上有创新,它以耳闻目见的民俗活动作为记述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民俗活动的进程与层次,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成为传统民俗记述的一大进步。它不再是上层统治者为了了解地方民情的观风问俗,也不是文人学士对奇风异俗的玩赏,而是对一般民众生活的重视。这种明智的态度决定了作者对民俗的记录方法的选择,从而突破了传统的“采风”手法,在传统民俗志的记述中确立了较规范的原则,这是《荆楚岁时记》的重大学术贡献,也是我们今天对它格外珍视的原因。

(3)作者对民俗有相当明确的理解,并且作者的理解接近于当代学术界对民俗的界定。从《荆楚岁时记》记述的民俗项目中,我们可以推论出作者有较为清晰的民俗观念。作者注意对节日信仰、禁忌、礼仪、饮食、娱乐、神话传说等民俗事象进行描述,以此呈现节日全貌。而在汉朝人的民俗记述中,虽然有区域的民俗描述,但大都注重风气的概述,缺少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记录。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民俗的理解不全面,仅仅从政教的角度看待民俗,观念上的局限,使他们不大可能注意民俗的细节,因此只能是一些感受性的文字,这种笼统性的描述使其科学价值大打折扣。而《荆楚岁时记》对岁时民俗的客观记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眼光与学识,也为我们探讨中国民俗观念及民俗事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本。

第二,从《荆楚岁时记》记叙的民俗内容看,它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我们通过对这部重要历史文本的解读,可以从中获取多方面的文化消息,从而明了岁时民俗的生成演进的一般轨迹。

《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当时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已有四百年之久,南方地区在江南政权的长期经营下,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民俗文化亦有着与北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岁时节日是民众时空观念的体现与民众生活的关节点,我们透过缠绕在岁时节日上的民俗事象,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民众的心理世界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荆楚岁时记》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民俗文献,它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当时的岁时民俗事象。我们以此为依据,结合其他典籍及文物考古的材

料，就可以寻绎出南朝荆楚人民的时间观念、宗教意识及其对天人关系的确定理解。

从《荆楚岁时记》的民俗记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荆楚地方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发现文化交融的浓厚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不少自汉朝传承下来的具有全国通俗意义的民俗事象，它表明了国家虽然长期处于分立状态，但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并未出现断裂，相反还出现了不少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民众意识的留存与传承以及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在历经四个世纪的乱离之后重新走向聚合的胶合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荆楚岁时记》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它为我们理解民族文化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新的说明。

六朝时期还是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时期。随着汉帝国的崩解，统一的王官记时系统失去了约束力，民众的时间观念凸现出来，形成了一套适应民众社会生活的岁时体系；又由于历法知识的进步与大众化，原来的干支记日变为一般的数字记日，因此节日有了具体的日期，如上巳节明确定在三月三日。节日系统趋于完备，民俗生活已明显脱离月令模式，这为民俗文化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意义。《荆楚岁时记》适时地记录了荆楚地区的岁时节日形态，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了解中古岁时民俗的窗口，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文本。

《荆楚岁时记》的发凡起例在传统民俗志中有着范本意义，同时它具体的民俗记述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本资料，堪称岁时民俗志中的经典，这就是我们在一千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对它报以热情的缘由。

二、《荆楚岁时记》研究的目前状况

自《荆楚岁时记》问世之后，辑录或记述岁时民俗的著述陆续不断，而且，它们在说明或解释民俗节日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引证《荆楚岁时记》。虽然这有部分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有好古的传统，但也的确说明了《荆楚岁时记》具有经典意义。可是关于《荆楚岁时记》的研究，自古及今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造成此种局面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局限。在传统学者的观念中只有研究经史才是学术主流，而在传统的文献分类中，《荆楚岁时记》一般被归入杂类（从各种书籍目录中可以明了这一点），因此此书

被传统学者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外，更不用说对它作民俗意义的研讨，人们大多把它当作掌故与欣赏性的文字，因此《荆楚岁时记》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评价。第二，由于《荆楚岁时记》原著久已散佚，人们一般注意于它的辑佚工作（后文将专门叙述此书的流传情况），因此很少注意它的意义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学界还是将其纳入古籍整理的范围。当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已有学者开始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荆楚岁时记》进行研究。上述是就国内情况概略而言，下面具体介绍一下目前国内外关于《荆楚岁时记》的整理与研究状况。

首先，从文本整理方面来看，国内《荆楚岁时记》的现代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继推出了四种校注本，有谭麟的《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姜彦稚辑校的《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宋金龙校注的《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及台湾王毓荣的《荆楚岁时记校注》（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在八十年代后期，几乎每年出一个版本，这种出版速度实在是前所未有。虽然这是一种巧合，但也正说明《荆楚岁时记》受学界重视的程度。这四种整理本的编校者都依傍一定的古本，对佚文作了繁简不同的辑录，有的还对版本源流及该书的价值作了程度不一的阐释，为人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国外有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校注的《荆楚岁时记》（平凡社1978年版），书后附有一篇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解说文字，反映了日本学者对本书的关注。

其次，从文本研究方面来看。国内有少量学者开始对《荆楚岁时记》的民俗内容进行研究，其中武汉大学李惠芳教授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她在论文《从〈荆楚岁时记〉看古代岁时节日风俗的生成》中，对我国传统的岁时文化作了有效的探讨，认为节期的选择与确立展现了我们祖先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而各种风俗活动的产生，则更多地体现了人类顽强的生命意识。因此，“深究各种节俗活动产生的最初根源，不难发现一个简单而又永恒的推动力：即人们祈望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岁岁平安”^①。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的《宗懔及其〈荆楚岁时记〉考述》一文对作者宗懔及《荆楚岁时

^① 方培元. 楚俗研究 [M].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3: 149.

记》的流传与价值作了一定的探讨。

国外对《荆楚岁时记》的研究开展较早，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日本守屋美都雄博士在1950年就出版了专著《校注荆楚岁时记——中国民俗之历史的研究》（帝国书院1950年版）一书，十三年之后，守屋博士又推出了《中国古岁时记的研究》（帝国书院1963年版），其中对早年关于《荆楚岁时记》的研究，作了若干增补与修订。守屋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流传及传入日本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守屋博士关于《荆楚岁时记》的文献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且，守屋博士有较为开阔的视野，他之所以选择岁时记的研究题目，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国家族的历史变迁时，“痛感”自身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不够，于是开始了对年中行事，即岁时的研究并最终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当然，守屋的研究还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他并未对《荆楚岁时记》的民俗意义作更深入的挖掘，由于学科的局限，守屋博士也没有对该书在时间民俗志方面的贡献作出应有的评述。

德国学者赫里嘉·吐尔斑（Turban, Helga）在1971年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论文题为《〈荆楚岁时记〉——一个中国的节令历纪》（*Das Ching-Chu sui-shi chi, ein chinesischer Festkalender*）。吐尔斑女士运用社会政治学的方法，对《荆楚岁时记》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懔作为江陵令，他修岁时记大概有如前人月令的意图，以辨风正俗，所不同的是宗懔不以礼俗而以地方民俗为主题，有从中原向地方变异的意味。这也大概符合南北朝政权分裂的情势^①。吐尔斑的研究颇具文化意味，为我们研究《荆楚岁时记》带来了新的思路。但是，宗懔写《荆楚岁时记》是否有政教的意图是值得怀疑的，况且此书作于何时尚无确证，一般人认为是在宗懔离开江陵之后，所以说吐尔斑的研究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因此她得出的某些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与斟酌。

以上是目前国外所能见到的有关《荆楚岁时记》的研究状况，可能由于笔者见闻的局限，尚有疏漏之处，容当日后补正。

^① 吐尔斑的论文情况，由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香港艺术发展局原研究员陈云根先生数度函告得知。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设想

《荆楚岁时记》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它的解读或阐释可以有多种角度。本书重点探讨它在记录民众时间意识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化意义。由于这是一部历史文献，它所反映的是历史社会中的民俗，所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是本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同时《荆楚岁时记》是古代的民俗记录，并且诸多民俗在荆楚及其他地区多有留存，因此本书相应采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分析法与一定的田野调查法），全面发掘它所蕴含的民俗内容。《荆楚岁时记》是一部经典的岁时民俗文献，对《荆楚岁时记》与其出现的时代及学术渊源作整体的探讨，需要采用文化学方法，以一种文化意识关注民俗事象，使我们的研究更为深入。本书也将适当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知识帮助我们说明某些问题。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书将运用上述方法，对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考古资料作综合的研究。当然，在论述具体问题时，根据对象的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

从国内外有关《荆楚岁时记》研究的现状看，《荆楚岁时记》的研究目前存在两种困难：第一，由于此书在宋元之际即已散佚，现行版本是明代人从类书中辑录的，一些内容需要考辨，而且这些辑本都有不同程度的疏漏，有鉴于此，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完善的定本，因此在研究材料的取舍上将颇费心思。第二，目前有关《荆楚岁时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底本的考订与辑佚上，系统阐释的理论深度不够，缺少可有效依傍的研究成果。这也是笔者必须面对的事实。

面对这无可回避的难题，笔者将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文本，笔者以辑录态度相对严谨的《广汉魏丛书》本为底本，广泛参照现今各种整理辑佚本，根据前人的考订及自己推敲判断，择善而从，尽量在资料的选择运用上做到准确客观。本书将在前人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研究视野，力争在对民众的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的理解方面，以及对传统民俗志的思考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关于本书的研究有四个设想：第一，将《荆楚岁时记》文本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寻找它出现的历史渊源与学术文化背景，比较它与月令的异同，从中总结出包括时间意识在内的若干有意义的民俗认识。第二，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述中，发掘荆楚民众的民俗观念，探

讨在南北朝分裂时代的中国地方民俗特性，以明了大变动时代民俗交融演变的情况。第三，从《荆楚岁时记》撰写体例、撰写原则及其在中国古代的长期流传中，总结传统民俗著述的一般特性，并对传统民俗志提出相应的看法。第四，以《荆楚岁时记》为文本，讨论民俗文献的传承扩布与民俗活态的传承扩布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限于时间关系，本书未及实现，只好待来日补足。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考虑到民俗生活及民俗记述与时代文化背景的关系十分重要，因此用了较大的篇幅予以讨论，这是为进一步研究《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民俗学史与中国民俗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作的基础铺垫，本书的重点仍然是围绕《荆楚岁时记》本身而展开的讨论。

第一章 荆楚与岁时：《荆楚岁时记》的题中之义

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中叶的《荆楚岁时记》，在学术分类中归属何处，在学人的知识谱系中占有何种位置，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不仅古人对它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即使今人也有不少将它视作有关风物故事的古体散文。这种理解不仅与读者的知识体系有关，也与《荆楚岁时记》内容的丰富有较大关联。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从《荆楚岁时记》的内容主旨出发，着力去阐释它题中应有之义。本章将对《荆楚岁时记》的作者、注者、文本传承情况及此书题名的限定意义作梳理与解说，为后文的讨论打下基础。

第一节 作者、注者及版本源流

《荆楚岁时记》现今通行本，一卷，宗懔著，杜公瞻注。由于原著亡佚较早，现存本为辑佚之作，对于此书局部内容的详略与编排序次，以及正文与注文的关系，人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就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一、作者的家世与生平

宗懔，字元懔，又字怀正^①，南朝梁人。约生于公元500年，卒于公元563年^②。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在西晋永嘉年间，八世祖宗承因军

① 《周书》卷四十二、《梁书》卷四十一、《北史》卷七十均有宗懔传，确定“宗怀正”为“宗懔”别字的是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他根据《北齐书·颜之推传》载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有与“吏部尚书宗怀正”一同校吏部书的事实，推论“怀正当是懔之字”。因为宗懔曾任职北周，在麟趾殿“刊定群书”，而颜亦在北周校书，余氏论断可取。

② 据《周书》本传，宗懔“保定中卒，年六十四”。保定是周武帝的第一个年号，时间为公元561—565年，取其中间年份，自然以563年为合适。由此逆推六十四年，即是宗懔出生的年代，所以我将其约定为公元500年。关于宗懔的生卒年代，还有一些不同的推算，但前后不过两三年的差别，无关大局，本书不一一具论。

功封柴桑县侯，授职宜都郡守，不久死于官任之上，他的子孙因而在江陵定居下来。自西晋末年至南齐末年，时间已经历了近两个世纪，侨居江陵的宗家除了宗谱上有关远祖的历史记述外，大概已经不再有客居的感觉，应该说宗家已是地道的荆州土著。宗氏家族在南朝宋、齐、梁三代，代有闻人，宗懔的父亲宗高之，便任梁山阴县令、南台侍御史。宗懔就出生在江陵这一官宦世家之中。

宗懔少年时聪颖明敏，又喜好读书，史称其“昼夜不倦”，与人交谈常常引经据典，乡里人因此称他为“小儿学士”。看来宗懔很早就是一位名闻乡里的博学少年。在“敦悦诗书”的梁代，才学就是晋身仕途的资本，宗懔受到家风熏陶，加上个人天赋及勤奋努力，具备了进入主流社会的一切条件，只等时机的到来。

梁武帝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宗懔二十六岁，被地方举为秀才^①。次年，梁武帝将镇守西土荆州的重任委派给第七子湘东王萧绎（公元508—554年），萧绎自幼即以好学为梁武帝所钟爱，年龄稍长后，更有“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②之誉。勤学又富有才名的萧绎出镇荆州时不过十八九岁，正意气风发，来到荆州不久，就寻访地方才俊，他对长史荆州人刘之遴说，“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刘之遴马上推荐了宗懔，湘东王听说有这样一位与自己有同样嗜好读书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即刻引见，令兼记室”（《北史》）。宗懔曾应湘东王之命，连夜撰写龙川庙碑，“诘朝呈上，梁元帝（萧绎）叹美之”。不同的出身，却有同样的禀赋与才情，从此二人情好三十年。宗懔由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大同六年（公元540年），萧绎移镇江州，宗懔随往，任刑狱参军，兼掌书记。历任临汝（今江西临川）、建成（今江西高安）、广晋（今江西鄱阳）三县县令，后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据史书记载，宗懔还是一位至诚的孝子，丧母的悲痛使他“哭辄呕血”，昏死数次，在提倡孝道的梁朝，这种苦孝受到人们的关注，“时论称之”（《周书》本传）。

^① 《北史》本传记为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是明显的误记。因为宗懔举秀才在其任湘东王府职事之前，而据《梁书》卷三载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冬十月湘东王萧绎始由丹阳尹改为荆州刺史。

^② 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35.